

凭窗读史

有些瞬间犹如璀璨星辰,照亮了时代前行的道路。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916年9月第二卷开始,改名为《新青年》)在上海横空出世,以思想文化启蒙为志,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光辉起点。

从1915年至1926年,《新青年》刊行11年,致力于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发起新文化运动,系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引领时代的新青年肩负救国复兴的使命,成为中国思想界走出传统、迈向现代化的标志。

《新青年》第一卷。

110年前《新青年》横空出世

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20世纪初,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的割据,使得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之中。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在哪里?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良策。

陈独秀(1879年—1942年)作为其中一员,自1901年至1915年先后5次到日本游学与活动。其间,他除了学习日、英、法文外,还广泛吸收了近代先进的思想。他参加过反清的暗杀团,参与编辑反清报纸《国民日报》,创办《安徽俗话报》——最早使用白话文进行通俗宣传的报刊之一,联系革命党人,重建民间反清的秘密组织岳王会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担任了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因参与各种革命活动,被列为逃犯而只身流亡日本。1915年,袁世凯加緊称帝步伐,国内到处弥漫着“尊孔复古”的逆流。一些有识之士痛彻心扉地认识到,政治革命不能代替思想革命。

陈独秀痛心于此,希望办一本在全国都有影响的杂志。1915年6月中旬,因陈独秀之妻高君曼病重咯血,经同乡好友汪孟邹写信催返,陈独秀从日本回国。来到上海后,他们一家寓居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里21号(今太仓路嵩山路西南)。在此期间,陈独秀酝酿办一份杂志,认为要“使共和名利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须办杂志”。他身处艰难气若虹,坚信“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经汪孟邹牵线搭桥,上海群益书社同意印行,双方达成了每月出一本、编辑费和稿费每本200元的合作条件。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顺利创刊,由陈独秀主编,群益书社发行。眉头文字为法文刊名“LA JEUNESSE”(青年),文字底下坐着一排青年人,左侧卷号为第一卷第一号。这是一份综合性文化月刊,每号约100页,六个号为一卷。1916年9月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从此一直沿用至终刊。

《青年杂志》甫一问世,就在中国大地掀起层层波澜。作为主编,陈独秀对青年寄予厚望,创刊号上的《社告》痛陈“国势陵夷,道衰学弊”的衰败现状,指出“后来责任,端在青年”。陈独秀认为要启蒙发民智,关键在于教育青年,扫除青年学生做官发财的观念,扫除反对共和的旧伦理、旧文学等,用新的科学、文化、伦理和思想取而代之。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很好地体现了创刊主旨。陈独秀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指出近代文明的特征,认为要实现社会改革,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从进化论的角度赞美青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决意唤醒青年真正觉醒,实现旧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前进。在文中“谨呈六义”以供青年参考: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条标准。

《青年杂志》创刊号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这犹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揭开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舆论阵地。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新文学”,一时成为先锋口号

《新青年》创刊一年多后,声誉日隆,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作为主办人及主编的陈独秀亦由此出名。

1916年11月,陈独秀为亚东图书馆招股一事抵京,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三顾旅馆邀其加入北大。陈独秀说:先试干三个月再决定是否留用,但《新青年》是一份不能离身的。蔡元培立刻劝他:“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罢。”1917年1月,当时的北京政府教育部签文,任命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学科学长。陈独秀寓居在北京东城区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今20号),在这里住了三年,直至1920年2月初离京到沪。

迁来北京的《新青年》杂志,较之上海时作了较大改进,由以安徽籍作者为主发展成以北京大学教授为主的同人刊物。陈独秀邀请北大同人加入编辑部。

自1918年1月第四卷第一号开始,实行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为编辑,这些成员都是各学科精英。他们结合自身所长,撰写许多批判旧文化、扶持新文化、促进社会变革的进步微文,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青年》以破竹之势吸纳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社会名宿与青年学生。蔡元培、钱玄同、章士钊、李大钊、沈尹默、胡适、林语堂、吴虞、俞平伯以及鲁迅、周作人等纷纷加入写作队伍。傅斯年、罗家伦、恽代英、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等青年作者群更是蔚为大观。一本杂志凝聚了现代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巨人与新锐,在百年中国堪称文化奇观。

鲁迅尚未加入编辑部之前,《新青年》就多次向他约稿。在真情打动之下,他尝试写出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刊出。该文很快造成一时轰动,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学作品”。鲁迅后来回忆说:“《新青年》的编辑者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1917年4月,青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了 his 著名体育论文——《体育之研

是把从前的谬见打退了许多。”周恩来在日记中还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所排孔、独身(即独立人格),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赞成。”

《新青年》致力传播民主科学思想,倡导文学革命,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逐渐形成了一股影响巨大的新思潮,极大地推进了反对封建愚昧和专制主义的斗争。

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将目光投向俄国,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刊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文章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乃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值李大钊编辑《新青年》,他将第六卷第五号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由此,《新青年》开始转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1920年2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到上海。8月,《新青年》移回上海复刊。复刊后增加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有关俄国革命理论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状况等资料,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编辑部新吸收了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等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新青年》不仅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1920年5月1日,陈独秀把《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篇幅达400页,比平时扩大一倍以上,刊登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和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纪念专刊共发表28篇文章,大部分反映了上海、北京、天津、长沙、芜湖、无锡、南京、唐山等地工人的状况,介绍了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大大推动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诞生的进程。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9月,《新青年》从第八卷起,改为党的机关刊物。自此,《新青年》实现了崭新的历史性跨越。《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的封面设计很好地体现了全新的编辑意图:封面正中是一个地球,从东西两个半球伸出两只有力的手,紧紧相握。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密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

《新青年》杂志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间有中断,总计出版发行了9卷54号。杂志从倡导思想启蒙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到国民大革命时期的“一代名刊”,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革新,其影响力延续了一个世纪。在《新青年》杂志的引导下,一大批新青年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力军。他们投身革命洪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百年后,当代新青年砥砺前行,续写新时代的恢宏篇章。

李忆店



斯诺赠送给项英的钢笔。



项英别着钢笔的照片。

一支钢笔 一支铁军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有一支老式的“派克”钢笔(现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暗红色的塑料笔身镀有金色的圈纹,已有点变黑的金黄色笔头依稀能看见“PARKER JUOFOLD PEN”字样。这是1938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赠送给时任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钢笔。

一支钢笔,书写一支铁军。斯诺用这支钢笔记录新四军浴血奋战的事迹,而这支“铁军”则成为插向日军的一把尖刀。

斯诺笔下的项英

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20世纪世界杰出的新闻记者、作家和评论家。他于1928年7月来到中国,1936年6月,他前往延安采访4个月,在民族抗战爆发之际,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出版后轰动海内外。

1938年7月,斯诺再度来到中国,从香港抵达汉口。当时,项英正准备赴延安参加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8月途经汉口时,经周恩来引荐,会见了斯诺。斯诺非常兴奋,迫不及待地采访了他。项英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出身、参加革命的历程、艰苦卓绝的江南三年游击战争和改编新四军后驰骋江南、抗击日军的事迹。也正因为这次采访,斯诺撰写了介绍项英及新四军的通讯。

1939年2月,斯诺夫人采写的《西行访问记》被译成中文印刷出版,因她没有见过项英,经斯诺许可,将斯诺采写的《项英》一文收录在该书,单独列为第八章。斯诺采写的通讯《项英的一支铁军》在《亚细亚》月刊1939年5月号发表后,先后被上海的《华美》周报(1939年6月10日第2卷第7期)和《良友》画报(1939年6月15日143期)节译转载。斯诺见到项英时,就对他的相貌和朴实的言谈举止产生敬意,他这样描述道:“他两手的指头是粗短而且胖结;他的嘴唇和鼻子是宽阔而且粗犷;他的牙齿有几颗已落掉了,是不规则而且不美观地突出着。但是他的笑容却是劳动中国的动人的笑容。”项英向斯诺讲述了自己苦难的家庭故事,他于1898年生于湖北省武昌,家庭贫苦,父亲是一个店铺里的伙计。项英10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他和母亲、妹妹相依为命。为了家庭生计,项英和幼小的妹妹来到一家织造厂做学徒工,经常挨打受虐待,从那时起他就养成了反叛的性格。《(西行访问记)》

项英于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项英很快成为武汉工人阶级的领袖之一,深孚众望。因其出色表现,项英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斯诺看来,“他是个‘党所造成’的人;他对于政治及军事上所知的一切,差不多全是在共产党及共产党的教导之下而学会的。”《(西行访问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临危受命,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策应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忠于职守的项英送走中央机关的最后一支队伍后,面对的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局面。斯诺在《项英的一支铁军》中写道:“1934年秋天,完成了掩护大队红军的撤退工作以后,他们遭遇了极大的困难,江西既不能立足,他们便散居在浙江、福建和广东的边界,他们的无线电通讯站最后也被破获,于是他们和共产党的西进部队失去了联络,变成了一支失落的孤军。”项英领导游击队运用游击战术原则,在群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英勇机智,九死一生,历经无数艰难险阻,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

斯诺被红军游击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以斗争求生存的英雄事迹所感动,“项英的那些坚强的老战士们,在这三年里头,是身历了真正的地狱……可是这小小的部队并没有屈服,他们拒绝缴械,始终保持着那革命的忠诚和团结,一直到底,对于信奉一个伟大主义的任何地方任何种族的人,这是个何等等的教训啊!”项英告诉斯诺:“我们军队里所剩下来的,差不多是纯粹的铁了。”斯诺感慨道,“真是,纯粹的铁,——锻炼成纯粹的钢的。而且,这支军队是从那著名的‘铁军’中,产生出来的宝贵蒸馏物,旧红军的第一批干部人物,原都是从‘铁军’中产生出来的。”《(西行访问记)》

结束采访后,斯诺将自己的“派克”钢笔赠送给项英。项英的坚强意志令他由衷钦佩,新四军在抗日战场的英勇表现更令他肃然起敬。

插向日军的一把尖刀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协议,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于同年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后移驻泾县云岭。新四军按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各支队向华中敌后挺进,实行战略展开,在大江南北展开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第1、第2支队相继进入江南敌后地区,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第3支队进抵皖南抗日前线,展开对敌作战;彭雪枫率新四军竹沟留守处部队一部东进,与豫东抗日游击第3支队一部和先遣大队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南下豫鄂边区,沿途会合各地抗日武装,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开展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信阳县四望山创建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驰骋华中,英勇奋战在抗日前线,成为插向日军华中派遣军的一把尖刀。

正如斯诺在《项英的一支铁军》中所说,“经过了无穷的袭击,包围,追逐,封锁,灾荒,疫病,这支有九条性命的红军,到现在忽而一变成为扬子江下流日新扩张游击势力中一个铁的中心了。”至1938年3月,新四军组建的消息传播四方,许多人来投军,“有的带来了步枪,少数的带钱和粮食,旧时的农卫队更带来了手榴弹、长矛和斧头来参加。新四军的人数从五千增加到一万,到7月的时光已达到了两万之数目了。”

新四军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令斯诺折服,深受鼓舞。他认为,应该让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江南红军游击队是如何出生入死、与数十倍的敌人周旋的,深刻理解这支久经血与火的淬炼、信仰坚定、意志坚强、深受人民爱戴和拥护的部队的光荣战史。

血与火淬炼的钢笔

1939年5月出版的《项英将军言论集》曾刊登一幅项英在学习的照片,下有文字说明:项英将军虽是一个工人出身,但却非常努力学习,有一次他对上海去慰劳的一位代表说:“新四军作战到现在只有半年,年龄极轻,需要加紧学习。同时兄弟(指项英自己)今年四十一岁,也是年轻的,可以说我的生活还是一个刚刚开始,因此更需要加紧学习。”爱学习的项英非常珍惜斯诺赠送的钢笔,一直随身携带,记笔记、写心得体会、起草文件、草拟电报都是用这支钢笔,并写下了《新阶段中新四军在江南抗战的任务》《本军成立两周年纪念感言》《论目前国内外情势》《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等文章。

1941年1月,蒋介石调集兵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伏击了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遭受重大损失,叶挺军长谈判时遭扣押,项英遇害。当时在香港的斯诺从廖承志处得知皖南事变真相后,十分震惊。他气愤至极,奋笔疾书,将皖南事变真相写成新闻稿,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禁令,毅然通过香港向海外媒体发稿。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星期六晚邮报》等发表了斯诺从香港发回的报道,揭露了事实真相。斯诺成为第一个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的记者。

项英牺牲后,他的警卫员深知这支钢笔的珍贵,突出敌人的重围后,将它交给新组建的新四军第7师政委曾希圣。曾希圣又把这支笔交给新四军军部的通信科长胡立教保存。1943年,胡立教把这支笔交给军部的机要秘书顾雪卿保管。1957年,顾雪卿把珍藏多年的这支钢笔上交到南京军区干部部。1959年,南京军区又把这支钢笔移交给军事博物馆珍藏。如今,这支钢笔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

郑学富